從陳子龍的《莊子》詮釋論其詩觀與生命抉擇*

謝明陽**

摘要

晚明雲間派代表著明代詩歌復古運動的第三次高峰，此派雖於《莊》學史上並無專門著作，但雲間派領導人陳子龍的文章中，卻有〈莊周論〉、〈譚子莊騷二學序〉二文。陳子龍並曾自號「大樽」，此詞即出自《莊子・逍遙遊》，意謂著陳子龍與《莊子》之間，確實具有若干連繫，值得我們加以闡發。本文將先討論陳子龍作於崇禎五年（1632）的〈莊周論〉，以及幾社文友宋存標、周立勳的同題之作，並藉由陳子龍心目中的莊子形象，分析復古詩學中所隱藏的悲抑內蘊；後則討論陳子龍於明亡前夕所作的〈譚子莊騷二學序〉，此文呈現了作者徘徊在莊子與屈子之間，不知何所依從的困境，即使陳子龍人生的最後結局是以屈原的方式寫下，然而在抉擇過程中，莊子般的思考卻是其生命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環節。

關鍵詞：莊子、屈原、晚明、雲間派、陳子龍

---

* 本論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晚明詩學流派視野中的《莊子》詮釋——以公安、竟陵、雲間三派為討論對象」之第三年研究成果，計畫編號：NSC-98-2410-H-259-062-MY3

**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陳子龍（1608-1647）為晚明詩歌流派的領袖人物，其所率領的派別稱為「雲間派」或「雲間詩派」。此一流派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崇禎二年（1629）幾社的成立，至崇禎五年（1632）《幾社壬申合稿》刊刻，詩派的發展得到了詩文總集的支持，規模漸形穩固；其後陳子龍、李雯（1607-1647）、宋徵輿（1617-1667）三人因詩藝高過於幾社中其他諸子，於是自成團體，加倍勤奮作詩，崇禎十七年（1644）《雲間三子新詩合稿》編成，此書可視為雲間派最重要的詩歌創作。直到順治四年（1647），陳子龍因抗清而被捕，於押解途中躍水殉國，雲間派遂隨著主角的殞世而告一段落[1]。

雲間派雖然是詩歌流派，但派別主角陳子龍卻也有自己的《莊子》詮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陳子龍有「大樽」之號，其弟子王澐（1619-1693）曾續編《陳子龍年譜》云：

> 先生諱子龍，字臥子，一字懋中，號軼符。……晚年，自號大樽，蓋寓意於莊生五石之瓠也。[2]

此號承自《莊子．逍遙遊》，莊子謂惠子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3] 意謂浮遊於江湖之上以求得適意，一度是陳子龍晚年所欲追尋的人生方向，只不過就生命最後的結局而言，「大樽」卻只能是一種名號，並無法成為託付終生的依靠。因此，選擇如屈原般自沉的陳

---

1 參謝明陽，《雲間詩派的詩學發展與流衍》（臺北：大安出版社，2010 年），頁 17-62。

2 〔明〕陳子龍著，〔清〕王澐續編，《陳子龍年譜》，收入〔明〕陳子龍，《陳子龍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附錄二，卷下，頁 726-727。

3 〔晉〕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南華真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卷 1，頁 17。

子龍，究竟如何來營造莊子、想像莊子，便成為有待申發的議題。

我們可以「幾社」、「雲間三子」作為雲間派發展前後的兩個重要階段，在此兩階段中，陳子龍正好皆有與《莊子》相關的文章出現。首先，在《幾社壬申合稿》中收錄了陳子龍、宋存標、周立勳（1598-1640）三人同題的社課之作〈莊周論〉，此文作於崇禎五年（1632），為幾社同仁早期的莊學論述，代表的是年輕陳子龍所認同的價值所在；另外，在陳子龍《安雅堂稿》中錄有〈譚子莊騷二學序〉，此文是為友人譚貞默（1590-？）而作，寫作時間當繫於明朝末年[4]，足以為陳子龍晚期的莊子思想作一定調。下文，我們將先透過〈莊周論〉來檢視雲間派成立之初，諸子如何詮釋莊子，並分析陳子龍之說與其詩學觀念的關係；其後再以〈譚子莊騷二學序〉對照陳子龍的生死抉擇，藉以彰顯莊子人格在其生命中所佔有的位置與意義。

二、三篇〈莊周論〉的入世精神

幾社成立的最初目的在於切磋舉業，以便同仁參與科考，因而八股制義的練習，即是社中人員最熱心從事的要務。崇禎四年（1631），幾社文人多於科舉考試中失利，故暫時轉換跑道，投注精神於古文辭的創作，諸子習作的詩文於崇禎五年（1632）底，輯為《幾社壬申合稿》，如陳子龍在《年譜》「崇禎五年壬申」條所記：「集同郡諸子治古文辭益盛，率限日程課，今世所傳《壬申文選》是也。」[5] 此書卷十五收錄了三篇同題為〈莊周論〉的文章，寫作者以陳子龍居首，宋存標、周立勳次之，此三文分別針對莊子著書立說的用心提出異於前賢的看法，文章立論各具巧思，卻同樣流露出幾社成員關懷現實的思

[4] 關於〈譚子莊騷二學序〉的寫作時間，詳本文第四節。

[5] 《陳子龍年譜》，見《陳子龍詩集》，附錄二，卷上，頁 647。

想傾向。以下逐篇論之。

陳子龍〈莊周論〉開端云：

> 憤必怨，怨必深，深必遠，遠必反。今我見人之醉而呼號者，我何怒哉？我怨夫禮飲而已。見人好色而至於死者，我怨夫陰陽而已。陰陽者必曰：「我未嘗欲人至於此極也。」我將曰：「豈非爾始？」彼無辭也。夫人因所見而追所始，既迹所從來，怨有所歸矣，則將忘其所見，豈非情所必至歟？[6]

文章首段並未出現莊子，只是就常理言之。文中提到，人有「憤」、「怨」之情直達「深」、「遠」之境，必須能「返（反）」，意謂著人們應該讓自己既深又遠的憤怨回到最初始的地方，重新釐清此一情感狀態所發生的緣由。例如見人酒醉而號呼，將明白心中的怨怒其實來自於「禮飲」；見人好色而至於死者，也將了解此怨其實來自於男女「陰陽」。這樣的思考方式，是從根本處來面對問題，亦即著重在「豈非爾始」之「始」，足以讓無意欲人至於此極的「陰陽」，無言以對。因此，凡事皆應探問根柢，因所見而「追所始」，若能真正追及事物的開始，心中的怨意必然能找到適當的歸止之所。

同理推之，《莊子》書中詆訾儒家聖賢，實導因於莊子見當時禮樂崩壞、教化淪喪，因而追溯根源，將怨恨的對象推返到崇尚禮樂教化的神聖賢人。依據此一觀察角度，陳子龍認為莊子的非聖之論只是發乎人之常情，再看〈莊周論〉下一段所論：

> 莊周者，其言恣怪迂侈，所非呵者，皆當世神聖賢人。以我觀

[6] 〔明〕杜騏徵等編，《幾社壬申合稿》，收於《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集部第34-35冊，冊35，卷15，頁52。此版本文字較難辨認，另可參看〔明〕陳子龍，《陳忠裕公全集》，收入《陳子龍文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卷21，頁151-154。

> 之，無甚誕僻，其所怨亦猶夫人之情而已。我見牛食禾者，其童子者必詈牛也，父兄之智者曰：「胡不詈畜牛者？」夫畜牛非有罪也，而詈牛者豈非不善怨乎？當戰國之時，量大較小，比強論弱，賦益繁制，戰設奇法，釣淫郁侈，殘殺君父，顛倒壯老，即紛紛而非之，彼必曰：「等威賦兵，妃御宮室，皆先王所以治天下也。」而何以服之哉？彼如此，其強辭不服也，奈何而不歸罪于古之人乎？[7]

童子見牛食禾，必然詈罵牛隻，父兄之智者卻認為此時應該斥責是畜牛者；此喻中，童子當指世俗凡人，父兄則一如睿智的莊子。以戰國時天下大亂的形勢而言，俗夫見君人者殘殺顛倒、以違逆為行，不免紛紛而非之，但君人者卻以此乃先王所以治天下為藉口，因而強辭不服。是以欲揭露帝王之暴行實不如莊周，直接將過錯推往古代的聖王，從根本處解決了此一難題。如此剖析，推證了莊子學說的發生是因為憂憤戰國亂世而思有以矯之，而其矯正天下之法，正在於回到遠古。

宋存標〈莊周論〉則認為，當時人視莊子為道家，卻不知「其深于縱橫之術」[8]，意即莊子深諳合縱連橫的道理，故假借老子之學以攻孔子之徒，意圖使自己的學說得以顯揚於世。試觀其說：

> 莊周時，儒墨盛顯，不從世所共尊者攻之，其說不著，此不得已而詆訾孔子之徒也。不從世所共非者附之，其辨不曲，并不得已而明老子之術也。甚知我與若互有勝負，惟攻者愈激，我

---

7 《幾社壬申合稿》，《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35，卷 15，頁 52。

8 《幾社壬申合稿》，《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35，卷 15，頁 53。此文亦有少數文字模糊難辨，另參〔明〕宋存標，《秋士偶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冊 11，頁 61。

之說愈得申于天下，乃後世合名之曰「老莊」。[9]

依宋存標之說，莊子之學原本可以獨立成家，其所以附庸於老子，目的只是為了贊和世所共非者，藉以攻擊世所共尊的孔子學術，正如下文所言：「周之洸汪自善，即天地陰陽，亦受其譏訶，何有于於老氏，而必同其說？則以儒術堅壘，攻之勢必假道于此也。」將莊子依附老子視為權術謀略，其論雖似不經，但就文章的力道而言，卻也呈現了令人深思的理據，如此說來，「老莊」雖然並稱為道家，但二者的區隔卻也相當明顯。不過，宋存標於總結全文時，卻又反過來指出老、莊思想亦有相通處：

雖然，二氏亦有異隱之同。老氏身隱矣，而猶著書；莊氏土苴萬物矣，而猶知千金為厚利，卿相為顯位。二子皆緦緦于中，不忍割棄天下，欲以其言遇。

二氏之所同在於「異隱」，意味著老、莊皆與尋常隱者有異。如老子，身雖隱而猶著書；而莊子，固然土苴萬物，卻仍知厚利顯位之所在，二人實皆「不忍割棄天下」而常憂懼於心。在老子與莊子若分若合的論述中，所浮現的莊子形象仍然是一位關切天下的憂世者。

周立勳〈莊周論〉更明指莊子立言的目的在於「救世」，其說云：

世稱莊子之學善自縱，不能器也。夫處亂世，不當然耶？當周之時，人騖游說，揣度形勢，料強弱。而莊子誕放剽剝，於世無所論習，其言使人蕩而失真，即以道德求之，不將以無用廢乎？然觀所稱引，皆以救世，世未得而用也。[10]

---

[9] 《幾社壬申合稿》，《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35，卷 15，頁 53。下文引宋存標文同此。

[10] 《幾社壬申合稿》，《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35，卷 15，頁 53。下文引周立勳文，均見頁 53-54。

《史記》言莊子思想「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11]，周立勳根據司馬遷之論而續作申發，認為世人不識莊子誕放之言的真義而廢棄之，此固然是人處亂世的合理現象，但莊子實仍有救世之心，只是未得重用而已。那麼，莊子的荒唐謬悠之言又應如何理解才能發揮功效？再看周立勳所云：

> 莊子蓋重悲之故，多道上古至德之事，乘莽渺，出六極，而遊于無何有，不以治天下感其心。使當世之諸侯，得其言而用之，方將小天地，混陰陽，齊得喪，一死生，又何暇以區區之國而戰爭不止，且卒至破滅也？

當時各國負地爭勝，分約立盟，主要的原因在於「大小之見明耳」[12]，莊子卻因為時人過度在意領土大小而感到悲傷，故而多述上古之事，欲使讀其書者，得以遊於無何有之鄉，忘懷治天下之事。文中更以為，當世諸侯如能體悟莊子的混同是非、齊一生死之理，當能避免戰亂破亡，則莊子所論又豈止是大而無用之言而已？依此論述，周立勳在文章結尾中更借用陰陽家鄒衍之言：「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意在宣告世人所認識的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實不必為寸土之狹而戰爭論辯，莊子的齊物之理同樣在此。

從陳子龍的莊子歸罪於古代聖王，到宋存標的莊子假託於老子，再到周立勳的莊子以齊物之論救世，三人所撰〈莊周論〉意旨雖然不同，但均可讀出幾社諸子藉著莊子的思考，來呈現個人對於當代世界的關注。對照陳子龍自撰《年譜》「天啟七年」（1627）條云：「其秋，先皇帝即位，誅逆奄，登賢俊，天下想望太平，予亦有用世之志矣。」

---

[11] 〔漢〕司馬遷，〈老子韓非列傳〉，《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84 年），卷 63，頁 2144。

[12] 此亦周立勳前引文語。

[13] 知崇禎皇帝即位時，陳子龍雖然年僅二十歲，卻已立下用世的決心；作〈莊周論〉時年二十五，此一用世之心可謂彌堅。非僅陳子龍為然，宋存標、周立勳亦為幾社的重要成員，同樣也都懷抱著經世理想。觀崇禎十一年（1638），陳子龍偕徐孚遠（1599-1665）、宋徵璧（1614-？）編輯《皇明經世文編》，宋存標與周立勳皆嘗參與其事。宋徵璧〈凡例〉指出此書之編纂：「若溯厥始事，則周勒卣立勳、李舒章雯、彭燕又賓、何愨人剛、徐聖期鳳彩、盛鄰汝翼進，及家伯氏子建存標、家季轅文徵輿，咸共商酌。」[14] 其論中，於友人首標周立勳，於同氏則先推其兄宋存標，可知周立勳、宋存標也是《皇明經世文編》的重要倡議者。依此而論，我們有充足的理由可以相信，陳子龍等三人〈莊周論〉中所具有的入世精神，其實是幾社諸子人格志趣的一種投射。

三、復古詩學的悲抑內蘊

上述三篇〈莊周論〉中，以陳子龍的文章最為特別，其文除前述之外，還有更為特殊的論點，試觀其說：

> 莊子，亂世之民也，而能文章，故其言傳耳。夫亂世之民，憤懣怨毒，無所聊賴，其怨既深，則於當世反若無所見者。忠厚之士，未嘗不歌咏先王而思其盛，今之詩歌是也。而辨激悲抑之人，則反刺詬古先，以蕩達其不平之心，若莊子者是也。二者其文異觀而其情一致也。[15]

---

[13] 《陳子龍年譜》，見《陳子龍詩集》，附錄二，卷上，頁 640。

[14] 〔明〕陳子龍、徐孚遠、宋徵璧編，《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凡例〉，頁 56。

[15] 《幾社壬申合稿》，《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35，卷 15，頁 52。

同處亂世，忠厚之士歌詠先王以思盛世，辨激悲抑之人若莊子者則刺詬古先，二者的處世方式並不相同，文章自亦殊觀。前者所擅長在於詩歌，後者所抒發則如《莊子》。但陳子龍卻認為，這些差別只是外在形跡，就內在情感而論，二者渴望天下重歸於清平的願望並無差別，故謂「其文異觀而其情一致」。以陳子龍而言，自然是屬於身處亂世的忠厚之士，並以復古詩歌為主要的創作方向，但既謂忠厚之士與辨激悲抑之人其情無二，則辨激悲抑當也是陳子龍心靈深處另一個潛藏未發的自我，在詮釋莊子的過程中，陳子龍正藉由莊子的形象來抒發心靈中被壓抑的聲音。

《幾社壬申合稿》另收錄陳子龍〈詩論〉一文，論點可以相互對照：

> 我觀于《詩》，雖頌皆刺也，時衰而思古之盛王。〈嵩高〉之美申，〈生民〉之譽甫，皆宣王之衰也。至于寄之離人思婦，必有甚深之思，而過情之怨，甚於後世者，故曰：「皆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16]

論中〈嵩高〉當作〈崧高〉，〈生民〉則為〈烝民〉之誤筆，二詩皆尹吉甫所作，屬〈大雅〉篇章。朱熹《詩集集註》釋〈崧高〉詩旨曰：「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又釋〈烝民〉詩旨曰：「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17]〈崧高〉之美申伯，〈烝民〉之譽仲山甫，表面雖皆為頌美之詩，但此二詩已作於宣王之衰，為變雅之作[18]，故陳子龍認為其詩表面雖然稱頌

---

[16] 《幾社壬申合稿》，《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35，卷 14，頁 41。另見《陳忠裕公全集》，收入《陳子龍文集》，卷 21，頁 142-143。

[17] 分見〔宋〕朱熹，《詩經集註》（臺北：群玉堂出版公司，1991 年），卷 7，頁 166；卷 7，頁 167。

[18] 鄭玄〈小大雅譜〉云：「〈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

而實質上已屬刺詩。陳子龍並進一步推申，以為《詩經》中的頌美之作或許若此，或許怨情更深，但都符合司馬遷〈太史公自序〉所云：「《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19] 要言之，陳子龍所說的「雖頌皆刺也，時衰而思古之盛王」，其中的「頌」，意涵正同於〈莊周論〉所說的忠厚之士歌詠先王；其中的「刺」，意涵則同於〈莊周論〉所說的辨激悲抑之士刺詬古先；既然雖頌皆刺，則二者的情意仍然可以取得一致。此處，陳子龍的詩學思想與莊子詮釋之間的基本理念是互通的。

循此理路，陳子龍的復古詩學每每遙思前代詩歌盛世，讀其文者，除了透過文字仰望古代詩歌之外，更應細心體會其中可能潛藏的悲抑情感。例如陳子龍為成仲龍（？-1654）家族所作的〈成氏詩集序〉云：

> 昭代之詩，自弘、正、嘉、隆之間，作者代興，古體知法黃初以前，近體取宗開元以前。雖其間不無利鈍，然大較彬彬有正始之遺。[20]

此說提出明確的復古之論，論中以黃初以前的漢魏古體、開元以前的盛唐近體為楷模，至於明代詩歌，則推前七子（弘治、正德）與後七子（嘉靖、隆慶），能追法於此，自可企及〈詩大序〉所云「正始之道，王化之基」[21]。詩歌的輝煌時代條列於此，以陳子龍身處的崇禎時期而言，必須上承前、後七子，才可能銜接詩歌的盛世，政治的盛

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崧高〉、〈烝民〉皆在〈民勞〉之後。見〔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十三經注疏》本），卷 9，頁 311。

19 〔漢〕司馬遷，〈太史公自序〉，《史記》，卷 130，頁 3300。

20 〔明〕陳子龍，《安雅堂稿》（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7 年），卷 3，頁 140。

21 《毛詩正義》，卷 1，頁 19。

世；但從另一角度來作思考，這樣的言論也可能是亂世之民嚮往太平之治所提出的一種訴求。再看陳子龍為復社領袖張溥（1602-1641）作〈七錄齋集序〉云：

> 國家景命累葉，文且三盛：敬皇帝時，李獻吉起北地為盛；肅皇帝時，王元美起吳又盛；今五、六十年矣，有能繼大雅，修微言，紹明古緒，意在斯乎！天如勉乎哉！[22]

文中雖云「文且三盛」，但其中文學的第三次興盛仍然有待完成。因而此段文字可以解讀為：陳子龍因深感崇禎一朝之政局已遠不及李夢陽（1472-1529）所處的弘治朝（敬皇帝），以及王世貞（1526-1590）所處的嘉靖朝（肅皇帝），故期待張溥能振衰起敝，同時恢復明朝的詩歌與政治。所言「天如勉乎哉」，話語中雖然對張溥的崛起抱持著高度的希望，但反過來說，卻也是對於國家當局的深深憂心。此類文章從特殊角度來看，可謂「雖頌皆刺」，持此觀點以論之，雲間派的復古詩學實別具另一番深意。

事實上，當陳子龍發表詩歌正變之論時，認為明代詩歌應該設法脫離時局之變，祈求其正，倘若詩之正體因為外在環境而轉變，將不免順應著時代，落入無法改易的迴境中。試觀陳子龍為宋徵輿作〈宋轅文詩稿序〉云：

> 今我與若偶流逸焉，諧慢輕俊則入於淫，淫則弱；偶振發焉，壯健剛激則入於武，武則厲。求其和平而合於大雅，蓋其難哉！宋子曰：「如子言，則是有正而無變也。」予曰：「不然。和平者，志也；其不能無正變者，時也。」[23]

---

[22] 《陳忠裕公全集》，收入《陳子龍文集》，卷 25，頁 365-366。

[23] 《安雅堂稿》，卷 2，頁 125。

依陳子龍之見，諧慢輕俊的詩作將陷入淫弱，壯健剛激的風格則流於武厲，皆非和平的大雅之聲。宋徵輿卻提出疑問，認為對詩歌作品定下這樣的標準，恐將「有正而無變」；然而陳子龍卻表明，他所贊成的只是詩歌作品的和平之志，此即詩歌之正體，至於時代，因已超出吾人的控制範圍，因此只能任其正變流轉。如此說來，陳子龍的詩歌盛世之說，只能說是詩人主觀的願望，與實際的政治情形將不免有所落差。抱持著這樣的想法，陳子龍在明朝國勢逐漸衰頹之際，仍顯示出以詩救國的決心，比如〈皇明詩選序〉雖然也提到「近世以來，淺陋靡薄，浸淫於衰亂矣」[24]，文末卻仍疾呼：

> 二三子生於萬曆之季，而慨然志在刪述，追游、夏之業，約於正經，以維心術，豈曰能之？國家景運之隆，啟迪其意智耳。聖天子方彙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移風易俗，返於醇古。[25]

此文作於崇禎十六年（1643）[26]，以時代而言，確實屬於衰頹亂世，但陳子龍仍不灰心，仍希望藉由《皇明詩選》的編選來建構詩歌經典，進一步改善政治環境。文中「聖天子方彙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同樣不能看作實情，而是出自於一介忠臣對於國家興盛的渴望，在此一情境下，讀其文便不應全盤接受，更應該深刻的體會陳子龍的寫作用心。

值得注意的是〈李舒章彷彿樓詩稿序〉。其文結尾處云及：「今天子銳意太平，景運有赫，方用群策，以定鴻業。而吾輩屬在草莽，不得與末議，惟當竭才思，成文章，比於歌虞、頌魯之作，以飾我明一

---

24 〔明〕陳子龍、〔清〕李雯、宋徵輿編，《皇明詩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陳子龍〈序〉，頁2。

25 同上註，陳子龍〈序〉，頁5。

26 關於《皇明詩選》的刊刻時間，詳本文第四節。

代之盛。」[27] 此論是從正面立說，主張追法歌頌虞舜之作以及《詩經》之〈魯頌〉，以修飾明詩的壯盛；但我們也可以逆向思考，理解為陳子龍是因「時衰而思古之盛王」，故而迂迴的表達了對於當時詩歌與政治的不滿。更重要者，陳子龍此文曾因時間不同而有兩種版本，其中關鍵文字也作了調整。據《陳忠裕公全集》所錄，在「夫詩衰於宋，明興尚沿餘習。北地、信陽力返風雅，歷下、瑯琊復長壇坫，其功不可掩，其宗尚不可非也」之後，文章接著說：

> 特數君子者，摹擬之功多而天然之資少，意主博大，差減風逸，氣極沉雄，未能深永。空同壯矣，而每多累句；滄溟精矣，而好襲陳華；弇州大矣，而時見卑詞；惟大復奕奕，頗能潔秀，而弱篇靡響，概乎不免。後人自矜其能，欲矯斯弊者，惟宜盛其才情，不必廢此簡格。[28]

此文當為崇禎八年（1635）時的原稿，之後由王昶（1724-1806）、莊師洛（1743-1812）根據李雯《彷彿樓詩稿》而收入全集[29]。在陳子龍原語中，認為李夢陽「每多累句」，李攀龍（1514-1570）「好襲陳華」，王世貞「時見卑詞」，詩作皆有明顯的缺點，即連陳子龍最喜歡的何景明（1483-1521）也不免有「弱篇靡響」，此中用意在於勉勵李雯能盛其才情，努力超越前、後七子中的領導人物。雖然在為好友所作的詩序中，陳子龍說出了坦率的話語，但在崇禎末年編輯《安雅堂稿》時，陳子龍卻將當年對於諸子的批評幾乎全部刪除，此書所收的同篇同段話語云：

---

27 《安雅堂稿》，卷 3，頁 149。

28 〔明〕陳子龍，〈彷彿樓詩稿序〉，《陳忠裕公全集》，收入《陳子龍文集》，卷 25，頁 378-379。

29 李雯，〈屬玉堂集序〉云：「會臥子有《屬玉堂》之編，而余亦有《彷彿樓》之刻，合二帙而觀之，可以知兩家之優劣矣。」意謂《彷彿樓詩稿》與陳子龍《屬玉堂集》同時完成，而《屬玉堂集》刊刻於崇禎八年，《彷彿樓詩稿》亦應印於同時。李雯文見《陳子龍詩集》，附錄三，頁 764。

> 特數君子者，摹擬之功能事頗極，自運之語難皆超乘。寡見之士不能窮源導流，迹其文貌，轉相因襲，保陳守姜，事同輿臺。薦紳比之木瓜，山林託為羔雁，徒具膚形，竟無神理。夫學者流失，雖賢聖不免，卒未聞拙匠遺累於規矩之制，敗軍歸咎於孫、吳之書也。後之作者欲矯斯弊，惟宜盛其才情，不必廢此簡格。[30]

此段改後的文字除了「自運之語難皆超乘」一語之外，對於李、何、王、李個人的負面評價，竟已消失，反而將詩歌發展的過錯推給因襲而保守的「寡見之士」。這顯示陳子龍在為李雯作序時，雖曾坦率的貶抑前、後七子，但隨著國勢的衰敗、時代的變遷，論中對前、後七子的評價卻不得不愈推愈高，直奉之為盛世的楷模。相較之下，修訂後的〈李舒章彷彿樓詩稿序〉更能成為陳子龍的定案文章，然而，借著兩篇異時而同文的比對，我們應該深深體會的仍是復古詩學所包藏的悲抑內蘊吧[31]!

四、〈譚子莊騷二學序〉的寫作意旨

陳子龍討論莊子的文章另有《安雅堂稿》卷四所錄〈譚子莊騷二學序〉。此譚子之姓名字號，陳子龍於文中俱未述及，僅以「譚子」名之，今考民國譚新嘉（1874-1939）所輯〈嘉興譚埽庵祭酒貞默著述目錄〉列有《莊子列眉》、《離騷刮目》二書，注云：「《莊》《騷》二種，陳子龍《安雅堂集》中有序。」[32] 可得知〈譚子莊騷二學序〉中的「譚子」係指譚貞默。譚貞默，字梁生，號埽庵，法名福徵，浙

---

[30] 《安雅堂稿》，卷 3，頁 148。

[31] 兩篇序文的比對，參謝明陽，《雲間詩派的詩學發展與流衍》，頁 193-195。

[32] 此目錄附於〔明〕譚貞默，《譚子雕蟲》，收於《叢書集成三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 年）冊 29，頁 755。

江嘉興人，崇禎元年（1628）進士，年七十餘卒[33]。再考譚貞默曾於《曹溪中興憨山肉祖後事因緣》中自述個人著作，云：「自孔孟《兩經見聖編》八千牒，新詩其間集二千牒，以至《南華》、《離騷》二經刮目，仙祖景升化書釋目，凡有屬筆，靡非教三道一之旨。」[34] 論中提到的卻是「《南華》、《離騷》二經刮目」，與譚新嘉所述的書名小異，但這應該是行文方便而作的些微改動。因此，可以確認陳子龍此文是為譚貞默《莊子列眉》、《離騷刮目》所題的序文[35]。

題序對象雖可考出，但此文的寫作時間仍未得詳，在此略作推估。首先，譚貞默為浙江嘉興人，陳子龍的文名大盛於浙江，是在崇禎十三年（1640）就任紹興推官之後，則此序的請託應該晚於是年；其次，《安雅堂稿》卷三別有〈譚子雕蟲序〉一文，是陳子龍為譚貞默另一著作《譚子雕蟲》而撰寫，而譚貞默〈譚子雕蟲自序〉題署「崇禎歲在壬午秋八月既望」[36]，壬午為崇禎十五年（1642），陳子龍〈譚子雕蟲序〉也應作於此年前後，倘若我們視陳子龍為譚貞默撰寫的兩篇序文為同一時期的作品，則〈譚子莊騷二學序〉也應該作於崇禎後期；再又，今觀《安雅堂稿》的編排次第，各卷中的文章大致依時間排序，卷四的〈譚子莊騷二學序〉其後緊接〈皇明詩選序〉、〈徐惠朗詩稿序〉，而《皇明詩選・詩選凡例》言：「此書始於庚辰，成於癸未。」[37]「癸未」即崇禎十六年（1643）。〈徐惠朗詩稿序〉亦云：「癸未之秋，

---

[33] 譚貞默生平，參見譚新嘉輯，《碧漪三集》，收於《叢書集成三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 年）冊 60，卷 3，頁 560。

[34] 〔明〕譚貞默著，譚新嘉輯，《曹溪中興憨山肉祖後事因緣》，收於《叢書集成三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 年），冊 86，頁 151。案，《兩經見聖編》，又云《三經見聖編》、《四書見聖編》，殘本見〔明〕譚貞默著，譚新嘉輯，《三經見聖編輯存》，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166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

[35] 參謝明陽，《明遺民的莊子定位論題》（臺北：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1 年），頁 149-150。

[36] 《譚子雕蟲》，收於《叢書集成三編》，冊 29，頁 759。

[37] 〔明〕陳子龍，〔清〕李雯、宋徵輿編，《皇明詩選》（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崇禎十六年刊

予自越還吳，惠朗出其所為詩示予。」[38] 亦明言「癸未」，證明此文同樣作於崇禎十六年。則〈譚子莊騷二學序〉的寫作應該稍前於此，或即同年所作。綜合上述諸項原因，可以判斷此文成於明末。

譚貞默的《莊子列眉》、《離騷刮目》今已未見，其《莊》《騷》並陳之論，僅聊見於〈夢楚雜詩．其一〉，詩云：「屈子故言愁，莊生詎言樂？閔茲罷薾人，導以無上覺。慈儉斥非寶，謙柔吐其姪。不獨芻狗賤，仁義與禮樂。史稱本老子，或云從之學。莊生乃大笑，吾師無名璞。真人聖人輩，蚤已混沌鑿。」[39] 此詩開端提及，屈子與莊生所言皆愁而非樂，故二者的情感相近；至第三句以降，重點在於莊子之師本於無名之樸，已和屈子無涉。今欲更明白譚氏的莊、屈同旨，只能藉著〈譚子莊騷二學序〉略窺其貌，文中云：

> 凡諸家之書，所引鳥獸蟲草之屬，或多不經。惟《莊子》所用名稱方產，最為爾雅，而《騷經》所載神異詭見之物，皆依於〈職方〉、《山海》之典。即其細者如此，則古人著書立言，豈有聊自恣放、不復條理者哉！[40]

《莊子》與《離騷》想像遼闊，言辭悠遠，但陳子龍看來，二書所言的鳥獸蟲草皆能爾雅有據，不為空洞之言。此一特色的拈出，正好與譚貞默《譚子雕蟲》的博物精神相吻合，正如陳子龍〈譚子雕蟲序〉所云：「每物賦之，名曰《雕蟲》，蓋自託乎小技，實游意於大雅矣。」[41] 再者，陳子龍此文更明確指出譚子已深得莊、屈二氏之學：

本），〈凡例〉，頁 1。此篇〈凡例〉為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影印本未收。

[38] 《安雅堂稿》，卷 4，頁 262。徐惠朗，即徐桓鑒，字惠朗，南直隸華亭人。

[39] 〔明〕譚貞默，《埽庵集》，收於《叢書集成三編》第 53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7 年），頁 221。「無名璞」，當作「無名樸」為是。

[40] 《安雅堂稿》，卷 4，頁 255。

[41] 《安雅堂稿》，卷 3，頁 187-188。

> 譚子生於千載之後，而能洞見二氏之學。於《莊》，則知其以〈外篇〉、〈雜篇〉分釋〈內篇〉之旨，而能自立於孔、老之外，以為一道；於《騷》，則能分其比物連類，以明其所託之意，且譜其歲年，次其篇什，以合於司馬氏之傳。嗟乎！其辭簡而其旨詳矣！[42]

譚貞默於《莊子》，知其書以〈內篇〉為主體，〈外〉、〈雜篇〉不過在於解釋〈內篇〉，莊子並已卓然獨立於孔子、老子之外，自成一家；於《離騷》，能明白此書比物連類之託意，且能推知此書篇章寫作的時間，以合於司馬遷所作的傳記。譚子《莊子列眉》、《離騷刮目》的概要，大約揭露於此。

然而，陳子龍的生命信仰與譚貞默的宗教取向不同，故〈譚子莊騷二學序〉所談論的，其實不是「教三道一」之旨。更重要的，陳子龍乃藉他人之酒杯以澆自己胸中之塊壘，文章開端即慷慨論述了心目中莊子與屈原的相同處：

> 戰國時，楚有莊子、屈子，皆賢人也，而跡其所為，絕相反。莊子遊天地之表，卻諸侯之聘，自託於不鳴之禽、不材之木，此無意當世者也。而屈子則自以宗臣受知遇，傷王之不明而國之削弱，悲傷鬱陶，沉淵以沒，斯甚不能忘情者也。以我觀之，則二子固有甚同者。夫莊子勤勤焉，欲返天下于驪連、赫胥之間，豈得為忘情之士？而屈子思謁虞帝而從彭咸，蓋於當世之人不數數然也。予嘗謂二子皆才高而善怨者，或至於死，或遁於無何有之鄉，隨其所遇而成耳。故二子所著之書，用心恢奇，逞辭荒怪，其宕逸變幻，亦有相類。[43]

---

[42] 《安雅堂稿》，卷 4，頁 255-256。

[43] 《安雅堂稿》，卷 4，頁 253-255。

遊天地之表的莊子，彷彿無意於當世；以宗臣受知遇的屈原，卻甚不能忘情。二者的表面行跡看似截然相反，不過在陳子龍的眼光中，二子實有相同之處。其相同處有兩點：其一，莊子欲使天下重返於驪連氏[44]、赫胥氏的時代，同樣也是無法忘情之士，而屈原欲進謁虞舜，最後效法彭咸自盡[45]，反而對於當世似若不在意。故莊、屈之間並無絕對的差異，重點在於我們觀察的角度，如果放眼於情感層面，可以說莊、屈立論的目的，皆在於設法改善天下，二人實質上均無法忘情於世。其二，莊、屈二子皆才高善怨，即使最後的選擇生死有異，但不過是個人遭逢的際遇有別，若就所著之書來看，二書實皆詼奇荒怪，以變幻處而言，誠有相似。因此，莊子卻諸侯之聘、屈子沉淵以沒的生命分殊，陳子龍認為只是屬於外在形跡，此形跡之異其實是根據個人不同的身分與境遇而形成，並不影響二人性情中眷戀天下卻又怨憤世俗的共通本質。這樣的思維模式其實與〈莊周論〉一文相同，差別處在於〈莊周論〉中忠厚之士的角色，在〈譚子莊騷二學序〉中已被屈原所取代。對於陳子龍的前後論述，我們可以作一個合理的推測：陳子龍在崇禎初期寫作〈莊周論〉時，明朝的政局尚稱穩固，此時以忠厚之士的身分寓刺於頌，或有可能重返世局於先王之盛；然而在崇禎後期，國事已糜爛不堪，忠厚之士既然無力改變時局，便只能悲傷鬱陶，化身為屈子。亦即陳子龍此時所面臨的生命抉擇已沒有忠厚之士的選項，而是徘徊在莊子之逍遙與屈子之沉江的兩難困境。

〈譚子莊騷二學序〉原是為譚貞默而作，但在述及譚子的看法之前，陳子龍其實已先深刻的反思自己的處境，縱然生命的終點仍未可

---

44 《莊子・胠篋》作「驪畜氏」。見《南華真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卷 4，頁 207。

45 〈離騷經〉云及「就重華而陳詞」，又云「願依彭咸之遺則」、「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見〔漢〕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注，《楚辭補注》（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3 年），卷 1，頁 20、頁 13、頁 47。

知。至於全文結尾，陳子龍同樣擺脫譚子的論述脈絡，進而提出問題：

> 然則譚子之獨有取於二子者，何居夫？譚子既不得志於時矣，屈子之言曰：「安能以身之皎皎，而受物之汶汶？」莊生之言曰：「寧游戲污瀆之中以快吾志焉。」譚子將安處乎？《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又曰：「尚口乃窮。」此君子之中道也，又奚取乎二子哉！[46]

文中，陳子龍問譚貞默既無法伸展長才，那麼於莊、屈二子之間將何所依從？究竟要像屈子，不以皎皎之身受物之汶汶？還是要像莊子，游戲污瀆之中以快吾志？此一人生價值的取決，恐怕是陳子龍對於自己疑問。自問仍須自答，陳子龍舉出與自身困境相類似的〈困卦〉(䷮)來回覆，〈困卦·彖傳〉云：「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47] 此卦之下卦為坎險，上卦則是兌說，占者若為君子，即使受困於一時，終將獲得亨通。又云：「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48] 意謂此時畢竟是艱困時期，有言無法取信於人，尚口只是徒增窮困，一切不如以靜默的心情來面對。陳子龍認同這樣的想法，認為君子遇此難關，可以執取中道而行，未必即要取法於莊、屈二子；不過，這只是理論層次上的思辨，現實人生中的難題，仍留待陳子龍以實際的作為寫下答案。

---

46 《安雅堂稿》，卷 4，頁 256-257。屈子言，原作「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見《楚辭補注》，〈漁父〉，卷 7，頁 180。莊生言，原作「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見《史記》，卷 63，〈老子韓非列傳〉，頁 2145。

47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正義，《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卷 5，頁 108。

48 同上註，《周易正義》，卷 5，頁 108。

五、大樽與彭咸之間的生命抉擇

陳子龍的「大樽」之號晚出，弟子王澐說是「晚年」，但實際時間仍未得詳。正式指出陳子龍開始使用此名號的是陸時隆〈侯文節傳〉，其文云：「吳勝兆事敗，窮治黨與。黃門與夏太學之旭隨一童子，奔嘐境投先生。先生恐不密，有僕劉馴者，慕義，託之匿黃門，馴欣然願效死。黃門乃易姓李，改字大樽，潛蹤馴家。」[49] 文中說，陳子龍曾參與吳勝兆（？-1647）的反清案，兵敗後與夏之旭（？-1647）投奔侯岐曾（1595-1647），侯岐曾遣僕人劉馴匿之，陳子龍遂易姓為李，並改字大樽。然而，吳勝兆案發生於順治四年（1647）四月十五、十六，至五月十三日陳子龍被捕殉國，則「大樽」一字竟然出現在生命如此危難之時，且短短使用不到一個月，不免啟人疑竇。再觀《陳子龍詩集》之附錄〈軼事〉云：

> 忠裕題仇英〈甘露渭橋圖〉云：「丙戌漢臘大樽獲觀於頑闇。」丙戌冬杪，侍大樽師於頑闇，予攜此圖索鑒，為之感慨神動，許作長歌以紀其盛，猝猝未果，遂成永恨，回首忽如昨日耳！絹素宛然，而鍾期不作，撫圖不免三歎！戊子冬日，王澐跋。[50]

據王澐的這段記載，可知陳子龍在順治三年（1646）題明代畫家仇英的畫作時，已明白書寫「丙戌漢臘大樽獲觀於頑闇」，則「大樽」之號在此年冬末已然確立，並曾見諸題跋，陸時隆之說並不正確。

我們閱讀陳子龍亡國以後所作的《焚餘草》，可以在其詩歌作品中，清楚的看到莊子的形象，此一莊子形象正可與其「大樽」之號相稱。以五古〈雜詩十首〉為例，其中第三首云：

---

[49] 《陳子龍年譜》，收入《陳子龍詩集》，附錄二，卷下，頁 722。

[50] 《陳子龍詩集》，附錄二，頁 749。

> 謀野愧良籌，遯荒適孤尚。荷篠豈無侶？飯牛今誰唱？弱草抽青畦，繁雲停丹嶂。戴鴁出陽林，楚葵含新漲。攬物鮮遺迹，撫悰得餘愴。抱甕漢水陰，種豆南山上。機心久不嬰，壯志今安望？終事采真遊，寥天獲昭曠。[51]

詩作開始說道，計謀於野中不免有愧良籌，惟有隱遁荒野才適合孤獨者。此時，荷篠丈人又多了作者這位隱居的友伴[52]，陳子龍雖已隱居，然而卻無法學習甯戚，滿懷政治理想而飯牛高歌[53]。青草繁雲，林鳥飛翔，攬觀外物多已非國家遺跡，欲撫平心靈傷痛也只能換得絲絲悲愴。詩末，內心無法完全平靜的陳子龍，只能向莊子尋求安慰。詩中的「抱甕漢水陰」、「機心久不嬰」，化用《莊子・天地》篇子貢遇漢陰丈人之典，意謂此時將學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萌生此退隱之念則是因為「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54]，若能擺脫機心的圍繞，自然可以消除壯志，安於農圃之事。詩作最後兩句「終事采真遊，寥天獲昭曠」，同樣也化用《莊子》書中語，前句見《莊子・天運》篇：「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後句則見《莊子・大宗師》：「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55] 意謂自己在抱甕灌園之後，將作神采真實之遊，以入於寂寥而與天為一。除了此首莊子意味濃厚的詩作

---

[51] 《陳子龍詩集》，卷 7，頁 202。

[52] 荷篠丈人典故，見〔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卷 18，〈微子〉，頁 166。

[53] 甯戚飯牛典故，見〔戰國〕呂不韋編，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上海：學林出版社，1995 年），卷 19，〈舉難〉，頁 1311。

[54] 《南華真經注疏》，卷 5，〈天地〉，頁 246-247。

[55] 《南華真經注疏》，卷 5，〈天運〉，頁 299；卷 3，〈大宗師〉，頁 160。

外，〈雜詩十首〉中與莊子思想相關者，尚有第八首：

> 不周既傾折，岱輿有播遷。浮沉極寓宇，聚散悲靈仙。何況微生質，安能常自全？焚林希靜翰，涸澤少恬鮮。秋籜隨時隕，春荑為誰妍？榮名爭寸晷，失意厭餘年。新壠即荒翳，故墟日芊綿。掩卷思陳迹，今昔遞相憐。行矣修混沌，毋為傷未然。[56]

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57]，岱輿之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58]，兩座名山的崩陷斷裂，用來比喻故國山河的變色。山河已然變色，除了上位者聚散無常之外，民眾如微生之質，又如何長保自全？「焚林」、「涸澤」代表的是動盪紛亂的時局，「秋籜」、「春荑」則是象徵生命的脆弱渺小，如今，欲求榮名不過爭得片刻顯耀，失意的生活才是剩餘歲月中的存在。今之新壠，昔之故墟，新舊交替中，不禁令人掩卷沉思，最終得到「行矣修混沌，毋為傷未然」的答案。「行矣修混沌」仍是借用《莊子・天地》篇子貢遇見漢陰丈人的典故，此篇中曾借孔子之口來描述漢陰丈人：「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閒者，汝將固驚邪？」[59] 意謂彼修行渾沌氏之道術，所守純一而心志不分，治乎本心而不治外物，此丈人者，明白可入於素地，無為而復歸純朴，將可全性抱神以遊世俗[60]。這也正是陳子龍對於自己的期望。

---

56 《陳子龍詩集》，卷 7，頁 203。

57 《淮南子・天文訓》：「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見〔漢〕劉安編，劉文典集解，《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3，頁 80。

58 《列子・湯問篇》：「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見楊伯峻集釋，《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卷 5，頁 154。

59 《南華真經注疏》，卷 5，〈天地〉，頁 249。

60 參用林希逸的解釋。見〔宋〕林希逸著，周啟成校注，《莊子鬳齋口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4，〈天地〉，頁 201。

然而在追慕莊子的同時，陳子龍的態度有時卻也顯得猶豫。例如〈雜詩十首・其四〉云：「遺世切烟霄，同群愧麚鹿。願言折瓊茅，往就靈氛卜。」遺世隱居的陳子龍，仍然有愧與麚鹿同群，於是願意折取瓊茅，向靈氛占卜。此乃化用〈離騷〉之語：「索蔓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之。」[61] 足見在取法莊子的同時，陳子龍心中並未忘懷屈原。又如〈雜詩十首・其七〉云：「我行率曠野，側足自屏營。狗屠竟安往？瀨女誰見明？」其中「狗屠」兩見於《史記・刺客列傳》，一為聶政「客游以為狗屠」，一為荊軻「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62]；「瀨女」則典出《吳越春秋》，是書載錄伍子胥自楚奔吳時，曾受瀨水女子饋食，此瀨女後來投江自沉以表明忠貞節操[63]。從詩句來看，狗屠或者瀨女，都曾經是陳子龍生命中認真考慮的選項。再看〈雜詩十首・其十〉云：「漁父刺湘纍，淑媛笑首陽。歠醨非我事，洗耳安可忘？」[64] 據〈漁父〉篇，漁父曾刺屈原云：「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屈原答曰：「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65] 另外「淑媛笑首陽」的典故[66]，也用伯夷、叔齊的餓死來加深為國捐軀的信念，只不過詩句卻用「洗耳安可忘」作結，暫時以不忘效法許由洗耳而擱置了此一生命的難題[67]。

---

61 《楚辭補注》，卷 1，頁 35。

62 《史記》，卷 86，頁 2522、頁 2528。

63 詳〔漢〕趙曄，《吳越春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王僚使公子光傳〉，頁 17。

64 本段引〈雜詩十首〉三次，諸詩分見《陳子龍詩集》，卷 7，頁 202、頁 203、頁 204。

65 《楚辭補注》，卷 7，頁 180。

66 劉孝標〈辯命論〉云：「夷叔斃淑媛之言。」李善注引《古史考》曰：「伯夷、叔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見〔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頁 2348。

67 《高士傳》：「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見〔晉〕皇甫謐，《高士傳》，《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冊 101，卷上，頁 564。

同樣表現出陳子龍面臨生死困惑、徘徊在莊子與屈原之間的組詩，還有〈仲春田居即事十首〉。此詩〈其四〉云：

> 濠上思莊叟，緱山憶子喬。種魚浮碧嶼，相鶴問青霄。大道隨時隱，雄心向晚消。所悲虞夏沒，無地著漁樵。[68]

莊子曾遊濠梁之上，體會出惠施無法感受到的儵魚出游從容之樂[69]；王子喬受道士浮邱公接往嵩山，三十餘年後曾乘白鶴停駐於緱氏山巔[70]。順隨著大道而退隱的陳子龍，遙思莊子之逍遙、王子喬之自在，萌生了追法二人的念頭，世俗的雄心壯志不免消退；然而，此時所悲者分明在於家國的滅沒，又何處可以過著漁樵般的無憂生活？亦即此詩雖言及莊子之樂，但莊子的身影在陳子龍的思想中終究只是無法牢固的夢想。再看此詩〈其五〉云：

> 山櫻荒館靜，岸柳蓽門疎。夜雨深丹壑，春星動碧虛。蓬蒿遲二仲，蘋藻弔三閭。歎息故人盡，無勞長者車。[71]

《三輔決錄》記載：「蔣詡歸鄉里，荊棘塞門。舍中有三徑，不出，惟求仲、羊仲從之游。二人不知何許人，皆治車為業，時人謂之二仲。」[72] 詩既云「蓬蒿遲二仲」，顯示陳子龍隱於荒館蓽門的時間太遲，再也無法遇見求仲、羊仲一般的友伴；此時，惟有準備蘋藻等祭品，祭弔三閭大夫屈原，以寄託目前蒼茫的心境。合觀前後兩首詩，顯示陳子龍在隱居與盡忠、莊子與屈子之間，依然陷入矛盾兩力的拉扯中。

---

68 《陳子龍詩集》，卷 12，頁 402。

69 見《南華真經注疏》，卷 6，〈秋水〉，頁 350-351。

70 見〔漢〕劉向著，王叔岷校箋，《列仙傳校箋》（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5 年），頁 65。

71 《陳子龍詩集》，卷 12，頁 402。

72 〔漢〕趙岐纂，〔晉〕摯虞注，〔清〕張澍輯，《三輔決錄》，《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 年），冊 101，卷 1，頁 353。

若以〈仲春田居即事十首〉的末章來說，陳子龍的最後選擇應該是偏向於屈原。此詩〈其十〉云：

> 大文收虎變，清嘯學鸞聲。澤畔貽香草，風前餌落英。石留貞女象，果得隱夫名。握粟辭詹尹，升沉我已輕。[73]

〈革卦〉（䷰）曰：「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74] 原任紹興推官的陳子龍，負有改革時政的任務，然而此時卻只能收起虎變的炳蔚之文，離開政壇而隱居田間，學習如鸞聲一般啼嘯。隱居後的陳子龍行吟澤畔，心中仍盼望可以一如屈原，有香草、落英的陪伴，以代表內心的忠貞潔淨。徘徊於此，不禁令人細想：倘若留貞女形象於後世，亦可得隱士之名，然而這是否真為此生最大的願望？此時握粟欲詢問卜者，卻終於決定辭退詹尹，只留下升沉之間輕盈的自己。詹尹為〈卜居〉中端策拂龜者，文中詹尹曾告訴屈原：「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事。」[75] 同樣的，陳子龍以己之心，行己之意，所謂「升沉我已輕」，其人生的最後結局似乎可以預料。

〈雜詩十首〉、〈仲春日居即事十首〉作於退隱之時，心中可以時有莊子之想，或者莊、屈並陳。然而，詩作若思及易代間壯烈犧牲的朋友，則莊子勢必退位，轉由屈原獨自現身。例如至友夏允彝（1596-1645）於順治二年（1645）投江殉國，加深了陳子龍生存於世的慚惶感，哀歎時代亂離的〈歲晏倣子美同谷七歌〉中，〈其六〉即在於悼念夏允彝，詩云：

> 瓊琚縞帶貽所歡，予為蕙兮子作蘭。黃輿欲裂九鼎沒，彭咸浩

---

73 《陳子龍詩集》，卷 12，頁 403。

74 《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卷 5，頁 112。

75 《楚辭補注》，卷 6，頁 178。

> 浩湘水寒。我獨何為化蕭艾，拊膺頓足摧心肝。嗚呼六歌兮歌哽咽，蛟龍流離海波竭！[76]

「瓊琚」用〈衛風・木瓜〉之典：「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77]「縞帶」則出自《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此文記載吳國季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78] 可知瓊琚、縞帶皆是當年互贈的精美禮物，互贈二人的心地也一如蕙蘭般高潔。如今大地震動崩裂，天下九州沉沒，友人夏允彝追隨赴水的彭咸，沉入浩浩湘水，而自己卻苟活於世而淪為蕭艾，不禁令人搥胸頓足，心肝摧裂。詩末，陳子龍哽咽悲歌，感歎自己一如流轉離散的蛟龍，只能受困於海波枯竭的淺灘。順治三年（1646），陳子龍在寫給夏允彝亡靈的〈報夏考功書〉中說道：

> 而乃竄處菰蘆之下，栖伏枋榆之閒，往來緇羽，混跡屠沽，若全無肺腑者。僕即大不肖，靦然面目如禽獸焉，而異日固有一死，其何以見足下？[79]

文中表明了生存者對於殉國者的羞愧，則陳子龍欲為采真之遊、欲修渾沌之術，又豈可得乎？栖伏「枋榆」一詞，讓人想到的是《莊子・逍遙遊》中，決起而飛，搶「榆枋」的蜩與鷽鳩[80]。既然有蜩與鷽鳩的悽遑之感，那麼，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的願望，恐怕是難以實現的夢想，陳子龍欲與夏允彝地下重見，除非同樣選擇了彭咸的道路。

徘徊於生死歧路的陳子龍，於順治四年（1647）遭到清廷逮捕，

---

[76] 《陳子龍詩集》，卷 10，頁 310。

[77] 《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卷 3，頁 141。

[78]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卷 39，頁 673。

[79] 《陳忠裕公全集》，收入《陳子龍文集》，卷 27，頁 486。

[80] 詳《南華真經注疏》，卷 1，頁 4。

在押解途中乘隙投水就義。莊子與屈原之間，陳子龍最後的抉擇是屈原，後人也每以屈子的高潔人格來比喻陳子龍，例如周兆龍〈古樂府・詠陳黃門〉云：「友我汨羅，媲彼潔白。」[81] 屈大均（1630-1696）〈泖口跨塘橋弔黃門陳臥子先生〉云：「三閭日月光相映，一劍乾坤恨未消。」[82] 王昶〈皇甫林弔陳黃門子龍故居〉云：「正則懷沙魂未散，萇宏藏血墓誰銘？」[83] 或者，直接將陳子龍的精神上比於彭咸，例如顧炎武（1613-1682）〈哭陳太僕〉云：「恥為南冠囚，竟從彭咸則。」[84] 宋徵璧〈江上吟效太白弔陳子〉云：「彭咸皓首素所期，舒情寫意那得知。」[85] 縱然，陳子龍的最終結局是以彭咸、屈原的方式完成，並且獲得了世俗的歌誦與讚揚，然而其人格精神並非一夕之間倉卒凝造，而是經過生命的層層磨難而終能淬煉成型。

現代學者的研究中，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洪業——清朝開國史》一書曾提到：

> 陳子龍依舊做一名復明份子，也是因為他別無出路了。因此，在關係到他的名譽之時，或者說由於惟恐辜負了這名譽，陳子龍一直不得不盡其所能。由忠義所認定的自我完善的人生義務，驅使他最後一次到松江去加入吳勝兆陰謀集團。[86]

---

[81] 《陳子龍詩集》，附錄四，〈哀弔詩〉，頁 794。周兆龍，字印武。

[82] 〔清〕屈大均，《翁山詩外》，《屈大均全集》第 1-2 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年），卷 10，頁 838。

[83] 〔清〕王昶，《春融堂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437-143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冊 1437，卷 1，頁 348。萇宏，即萇弘，《莊子・外物》：「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

[84] 〔清〕顧炎武著，王冀民箋釋，《顧亭林詩箋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卷 1，頁 112。南冠囚，典出《左傳・成公九年》：「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

[85] 《陳子龍詩集》，附錄四，〈哀弔詩〉，頁 796。

[86] 〔美〕魏斐德著，陳蘇鎮、薄小瑩等譯，《洪業——清朝開國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如此看待陳子龍，就生命終點而言為是；但是以陳子龍依違在莊子與屈原之間的心理過程而言，所論卻不免過於單純。或許可以改換說法，認為陳子龍為當時文壇的泰斗，為明代政界的有力者，這些條件，使得在他的心目中，莊子式的生活終究只是一種遙遠的想望，而屈子式的命運才是適合他的道路。再看趙園〈忠義與遺民的故事〉云：

> 在我讀來，無論祁彪佳、陳子龍還是黃道周，其人的「殉明前史」較之就義的瞬間，都更有其沉重性。左右他們的選擇的，人生義務、道德律令，（作為「公眾人物」的）社會責任感等等，糾結而成複雜的網絡。[87]

誠然，事件發展的最後結局已然寫下，但重點卻在於到達終點前的醞釀過程。陳子龍在殉國以前，確實曾歷經莊子與屈子之間的思考、對比、掙扎，即使懷抱著「天地一遺民」[88] 的願望，卻又暗藏「偷生愧國殤」[89] 的不安，正是在複雜心理的交錯之下，陳子龍選擇放棄了莊子，以屈原作為此生的終站。

六、結語

陳子龍的「大樽」之號晚出，此一別號象徵著詩人有所渴望但卻無法順利達成的人生目標，在後人的論述中，也經常以此號作為紀念。例如，錢价人（？-1662）《今詩粹》云：「大樽先生獨宗濟南，力返大雅，風氣丕變，乃有雲間詩體之號。」[90] 或如龔翔麟（1658-1733）

2005 年），第十章〈危時計拙〉，頁 259。

87 趙園，《想像與敘述》（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年），頁 89。

88 〈避地示勝時六首．其三〉之句。《陳子龍詩集》，卷 12，頁 401。

89 〈奉先大母歸葬廬居述懷四首．其三〉之句。《陳子龍詩集》，卷 12，頁 397。

90 〔清〕錢价人、魏耕編，《今詩粹》（臺北：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清初刊本），〈凡例〉，頁 1。濟南，指後子七之李攀龍。

云：「若詩當公安、竟陵之後，雅音漸亡，曼聲并作，大樽力返於正，翦其榛蕪棘荊，驅其狐狸猸貉，廓清之功，詎可藉口七子流派并攢譏及焉？。」[91] 二人所言，即視「大樽」為雲間派以及明代復古詩風的代表人物。令人注意的是，宋徵璧在早期詩作中竟也提及此一名號，例如作於崇禎六年（1633）的〈秋塘曲〉，詩序云「宋子與大樽泛于秋塘」，崇禎八年（1635）也作有〈早秋同大樽舒章賦〉七絕二首，因陳子龍當時並無「大樽」之稱，此號當是宋徵璧日後編輯詩集所作的更改[92]。此中緣由，正如陳寅恪《柳如是別傳》所示：

> 何以宋氏亦稱之為大樽？明是後來尚木編集時所追改。蓋臥子以抗清死節。清人著述在乾隆朝尚未表揚臥子以前，自宜有所避忌。往住多以不甚顯著之別號，即「大樽」，稱臥子。況宋氏前與臥子關係密切，後乃改仕新朝，更當有所隱諱也。[93]

意謂陳子龍在清朝初期為忌諱人物，時人多避其名，而以「大樽」稱之，宋徵璧因另仕清朝，故於舊作刊行時一併追改。這樣的推論固然無誤，但以「大樽」來稱呼陳子龍，甚至用此詞來涵蓋他的一生，卻足以喚醒我們莊子與陳子龍之間的關聯，實際上具有相當特殊的意義。

回顧本文，首先分析了陳子龍、宋存標、周立勳三人的〈莊周論〉，諸文皆積極而入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陳子龍之作，其文認為忠厚之士歌誦先王，而辨激悲抑之人則刺詬古先，二者其情一致。推究之，陳子龍其實是將他內心的莊子隱藏在詩人的身後，故而復古詩學之中

---

91 〔清〕朱彝尊，《明詩綜》（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卷 75，頁 3698。龔翔麟，字天石，號蘅圃，浙江仁和人。

92 宋徵璧詩集尚無緣親見，此據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頁 313-314。

93 同上註，《柳如是別傳》，頁 314。

即暗藏著悲抑之情。後論陳子龍寫於明末的〈譚子莊騷二學序〉，此篇為友人譚貞默所作的序文，認為莊、屈二子皆才高而善怨，並以君子行中道而暫時拋開了二者的選擇。到了入清以後，陳子龍的詩作同樣困惑在莊子與屈子之間，其最後的抉擇雖然是屈原，但卻也留下「大樽」之名，如實的見證了莊子在其心目中的重要性。

（責任校對：陳冠薇）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戰國〕呂不韋編，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上海：學林出版社，1995年。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

〔漢〕劉安編，劉文典集解，《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漢〕司馬遷，《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84年。

〔漢〕劉向著，王叔岷校箋，《列仙傳校箋》，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5年。

〔漢〕趙曄，《吳越春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

〔漢〕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注，《楚辭補注》，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3年。

〔漢〕趙岐纂，〔晉〕摯虞注，〔清〕張澍輯，《三輔決錄》，《叢書集成新編》本，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年。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正義，《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

〔晉〕皇甫謐，《高士傳》，《叢書集成新編》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

〔晉〕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南華真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宋〕朱熹，《詩經集註》，臺北：群玉堂出版公司，1991 年。

〔宋〕林希逸著，周啟成校注，《莊子鬳齋口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明〕杜騏徵等編，《幾社壬申合稿》，《四庫禁燬書叢刊》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明〕陳子龍、徐孚遠、宋徵璧編，《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明〕陳子龍，《陳子龍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

〔明〕陳子龍，《安雅堂稿》，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7 年。

〔明〕陳子龍，《陳忠裕公全集》，收入《陳子龍文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 年。

〔明〕陳子龍、〔清〕李雯、宋徵輿編，《皇明詩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 年。

〔明〕陳子龍、〔清〕李雯、宋徵輿編，《皇明詩選》，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崇禎十六年刊本。

〔明〕陳子龍著，〔清〕王澐續編，《陳子龍年譜》，收入《陳子龍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

〔明〕譚貞默，《埽庵集》，《叢書集成三編》本，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7 年。

〔明〕譚貞默，《譚子雕蟲》，《叢書集成三編》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 年。

〔明〕譚貞默著，譚新嘉輯，《三經見聖編輯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

〔明〕譚貞默著，譚新嘉輯，《曹溪中興憨山肉祖後事因緣》，《叢書集成三編》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 年。

〔明〕宋存標，《秋士偶編》，《四庫禁燬書叢刊》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清〕錢价人、魏耕編，《今詩粹》，臺北：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清初刊本。
〔清〕顧炎武著，王冀民箋釋，《顧亭林詩箋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清〕朱彝尊，《明詩綜》，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清〕屈大均，《翁山詩外》，《屈大均全集》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
〔清〕王昶，《春融堂集》，《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譚新嘉輯，《碧漪三集》，《叢書集成三編》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
楊伯峻集釋，《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二、近人論著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趙園，《想像與敘述》，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
謝明陽，《明遺民的莊子定位論題》，臺北：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1年。
謝明陽，《雲間詩派的詩學發展與流衍》，臺北：大安出版社，2010年。
〔美〕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著，陳蘇鎮、薄小瑩等譯，《洪業——清朝開國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

清華學報

Chen Zilong's 陳子龍 Interpretation of the *Zhuangzi*《莊子》and its Relation to His Poetics and Life Choices

Ming-yang Hsieh*

Abstract

The Yun-Jian school 雲間派 of the late Ming represents the third climax of Ming dynasty classical poetics. Although the adherents of the school produced no comprehensive works on the *Zhuangzi*《莊子》, their leader, Chen Zilong 陳子龍, composed two essays on the text, his *On Zhuang Zhou*〈莊周論〉and the *Preface to Tanzi's Works on Zhuangzi and Li Sao* 〈譚子莊騷二學序〉. Chen once referred to himself as "Dazun" 大樽, a phrase derived from the *Xiaoyao you* 〈逍遙遊〉 chapter of the *Zhuangzi*, which suggests that Chen's view of the text is worth exploring in greater detail. This article first discusses Chen's *On Zhuang Zhou*, written in the fifth year of the Chongzhen 崇禎 reign (1632 A.D.), and compares it to works of the same title penned by two poets of the Ji Society 幾社, Song Cunbiao 宋存標 and Zhou Lixun 周立勳. Through an analysis of Chen's image of Zhuangzi, the article uncovers the melancholy intent hidden in classical poetics. It then turns to a discussion of the *Preface to Tanzi's Works on Zhuangzi and Li Sao*, which Chen completed on the eve of the Ming dynasty's collapse. This work reveals Chen's indecision with respect to Zhuangzi and Quzi 屈子,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as well as the dilemma he faced in deciding which thinker to follow. Even though Chen ended his life as Qu Yuan 屈原 did, Zhuangzi's mode of thinking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his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Key words: Zhuangzi 莊子, Qu Yuan 屈原,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Yun-Jian School 雲間派, Chen Zilong 陳子龍